

羽离子 / 著



# 明清史

## 讲稿

齊魯書社

羽离子 / 著



# 明清史

## 讲稿

齊魯書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史讲稿/羽离子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4  
ISBN 978-7-5333-1981-6

I. 明… II. 羽… III. 中国—古代史—研究—明清时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3980 号

## 明清史讲稿

羽离子 著

---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http://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mailto: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981-6  
定 价 29.00 元

---

## 绪 言

明清两朝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大于明以前的时代。要深入认识近现代乃至当代的中国，除了审视此期内的社会脉络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外，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还不得不回溯明清的社会。在通史著作中，有许多值得进一步重视的内容或很有启示意义的内容不能被较多地讲授，因此就有必要在断代性的专题史方面给予介绍和探讨；这就是撰写本书的初衷。此《明清史论稿》中各论的延展性较好，各自涉及了较多的方面，能反映宽广的社会领域。

我在明清史方面先后研究和讲授到的一些内容还有“宋濂与方孝孺事件”、“明代的倭患与抗倭”、“明代的荒诞政治”、“明清的非主流宗教”、“明清华人在东南亚”、“清代的琉球问题”、“庚款教育和留学运动”、“清代艺术的美学分化”等等，之所以没有将之全部编入此集之中，原因有多种：有的专论的内容太复杂，如“明清的非主流宗教”和“明清华人在东南亚”、“明清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发展与不对称”等即是。作讲座、开研究坊或讲课时可提纲挈领，有所侧重；但印成文稿，则将不得不面面俱到，兼顾平衡；这样，势必篇章浩大。有的专论的探讨性太强，如“清代艺术的美学分化”和“清代国民奴性精神和卑琐人格的空前扩张”等，其内容还有待丰富，使之更成熟。有的专论则将另行汇编。此外，如将之全部都编印成集，其集将厚达数卷，自非财力所能及。

个别专题中的部分如关于明清文字狱的，他人已就其一些方面

撰写和出版了专著。我之所以仍将之列入本讲稿中，不仅是通史史著的相关记述十分有限，更在于“文字狱”是其时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甚至成了难以彻底根除的民族文化中的沉疴。观察明清史，切不可忽略之而应可镜鉴于后人；故为之重做梳理，考补史实，而另从不同的方面作了阐论。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向来反对只把眼光局限在中国。因此，我注意加入了一些中外历史的关系研究和比较研究。只有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坐标网中加以考察，才可能更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历史。

明清两代是中国许多世纪以来的集权专制社会发展至极端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已“烂熟”而难以建立创新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言行被传统或专制所禁锢，被制约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严重扭曲。而不择手段地营建和以血腥暴力来维系这一专制金字塔的最大代表正是处于这两大王朝的专制体系顶端的帝王。我们不应该以继承传统文化为理由而讳言明清王朝的黑暗或美化专制帝王。更何况即使是传统文化，也必须是有所批判地、有所选择地继承。如果一并去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那么这等研究与宣传的潜在的危害性将十分巨大。

对历史学家而言，“史识”与“史德”的重要性远胜于“史才”，全面而透彻地洞悉历史，直笔以书，深刻析论，尤不可缺。本书有不少独见的史料和事实，但其它的独特性还在于此书对人们已知的史料与史事的新的认知。本书的许多内容都是在学术界独辟草莱的，如陈论“明代州府的日用摊派”、“制约皇权的势力的衰减”、“中国与西欧王权的比较”、“俄罗斯首次对清政府赠书始末”和“清末地方议会的创立”等等。我的一些意见还力排众议，与公识大相径庭，如“明代万国来朝中的伪象”、“明清时中国文化的西去”和“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等等专题中的立论即是。这对启导



## 目 录

## 绪 言

## 第一讲

明代万国来朝中的伪象/1

## 第二讲

明代地方的日用摊派/30

## 第三讲

关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若干问题/49

## 第四讲

明清时中国文化的西去/96

## 第五讲

明清文字狱/135

## 第六讲

欧洲近世科学文化的东渐/194

## 第七讲

清代时专制发展至顶峰和皇权的绝对化/246

## 第八讲

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314

## 第一讲 明代万国来朝中的伪象

在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礼部在移暹罗国王的檄中称：“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诸蕃莫不来庭。”君臣对明朝初建时诸蕃来朝的盛况仍念念不忘。

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王景弘等受命最后一次出海往诸蕃国，在福建候风开洋时，刻石于长乐县。刻辞谓：“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蕃，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贄，重译来朝。”对明初海外诸蕃，皆捧珍执贄，重译来朝的情况有了清楚的记载。

有明一代，万国来朝的盛况，主要出现在明初的洪武、永乐、宣德等数朝。自明以降，直到今日，称颂明初时万国来朝的盛况的文章数不胜数。其实，明前期的中外交往，只有两次高潮，一是明朝开国之初有一批海外小国的使节来；二是明燕王朱棣夺得政权称帝后，派郑和等出使国外，宣德帝即位后，也继续派郑和等“仍统舟师往诸蕃国，开读赏赐”。促使了一批海外小国的使臣来明朝。两次高潮之间，有一段外国很少来“朝贡”的中外交往上的平静期。明太祖朱元璋把外国人自明初昙花一现地来过中国后就再也不来的原因归纳作内是宰相胡惟庸作乱，外是三佛齐国奸诈捣蛋。前列的礼部奉旨作的《移暹罗国王檄》述：“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诸蕃莫不来庭。岂意胡惟庸造乱，三佛齐乃生间谍，诒我信使，肆行



巧诈。”

“胡惟庸造乱”，不过是明太祖杀功臣的借口。三佛齐，在今苏门答腊岛，那时只不过是一个又名为“旧港”的较大的海港而已，哪有多大力量去阻止其它的各国向大明的朝贡？况且从日本、越南、占城、暹罗、缅甸各国至大明，也无须取道三佛齐。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明初时外国来明朝贡的高潮？而明开国以后外邦来朝的终止和郑和等结束出使以后，蕃国来贡的盛况终至消失的原因又是什么？明初的万邦来仪有其真实的一面，但也包含着伪像。对前一面，肯定和称颂的文章已多，我本人亦多所赞同，故无须赘言；因此，这里主要就后面作些讨论。依我考察，迤邐朝贡，咸与输诚，往往并非是亚洲、非洲各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而多只是明朝最高统治者自己想方设法，不惜代价地导演出来的。

明初，原先的蒙古族的中央王朝并未消亡，只是撤到了中国北方的朔漠地区。

朱元璋称帝建大明国，要紧的一件事，就是立刻派人去周边各国游说，争取各国有使节来明国朝贺或奉贡，以造成自己已是奄有万方，天下归心的圣君，明朝已是顺天应命，四宾咸服的正统大朝的仪象。朱元璋称帝的第一年，就派了人去朝鲜“赐玺书”。但朝鲜当时仍与北元交通，而未立刻拿定主意与明来往。所以第二年，朱元璋又派人去，这次还“送还其国流人”以示好。加上北元大势已蹙，朝鲜终于决定派人来表贺大明国。那时，新朝底定，有外国人来朝贺，于新朝皇帝是很有面子的事。连外国人都景仰来了，甚至“奉正朔”了，新政权对国内民众的号召力就陡地提高了许多，就更加是名正言顺的正统王朝而无疑了。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急急遣使各国，希望它们能来使以作礼一番。

## 一、与东南亚的交往

洪武元年，明使还分头去了占城（今越南中部）、真腊（其要地在今柬埔寨）、暹罗（今泰国）。洪武二年，朱元璋还把自己的即位诏书和《大统历》给了元末时来华的爪哇使臣，让他持归本国。但并不见爪哇有何反应。于是在洪武三年，朱元璋又颁诏中外，称：“自古为天下主者，视天地所覆载，日月所照临，若远若近，生人之类，莫不欲其安土而乐生。然必中国安，而后四方万国顺附。迩元君妥懽帖木儿，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天下英雄，分裂疆宇。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军民共尊朕居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底定。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来朝贡。今年遣将北征，始知元君已没，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各安其所。又虑诸蕃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咸使闻知。”<sup>①</sup>

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加压、敦促和心焦如焚的外交官们的拼命奔走，总算有了一批海外小邦如三佛齐、浞泥（今马来的加里曼丹岛北部文莱一带）、百花（西南海中一岛）、彭亨（今马来半岛上的彭亨州一带）、尼八剌国（今尼泊尔）等国的人随中国使节来到大明。其中的外交活动并不顺利。例如：洪武三年八月，御史张敬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秩受命同使浞泥，从泉州下海，辗转了半年到闍婆；又踰月，才到该国。但起先浞泥“王马合谟沙傲慢不为礼”，<sup>②</sup>后来又托称其国穷，要三年后才肯来中国。浞泥的宗主国闍婆又阻挠，浞泥就趁势不肯奉贡了。沈秩威胁道：“尔畏闍婆，

<sup>①</sup> 《明史》卷三百二十四《列传第二百一十二》。

<sup>②</sup> 《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外国列传六》。

反不畏天朝邪!”淳泥王才乖乖地派人带了土特产等跟着张敬之来到中国。当然，淳泥王一点都没有吃亏，明太祖大喜，“宴赉甚厚”。

而中国使节在三佛齐，后来还送了性命。洪武三年，明太祖遣行人赵述去三佛齐。次年，三佛齐派人奉金叶表及土产跟赵述来华。当时户部报告说三佛齐的货舶到泉州，宜征税，明太祖优待外国人，命免征税。以后三佛齐使屡贡土产，以厚赏。好景不长，几年后，在洪武十年，三佛齐受爪哇指使，骗明使至后杀了明使。“天子亦不能问罪，其国益衰，贡使遂绝。”明太祖一点办法也没有。

明宪宗成化十八年（1482年），据《明史》卷三二四《暹罗传》记载暹罗王死后：“十八年，（王子）遣使朝贡，且告父丧。命给事中林霄、行人姚隆封其（羽离注：国王的）子国隆勃刺略坤息刺（《实录》中的‘刺’作‘利’）尤地（《实录》中在此增‘亚’字）。为王。”此段记载让人感到暹罗谦恭得很，



明朝的外交官到了外国，常常要颁赐明朝的《大统历》，以象征接受此历书的国家已经“奉正朔”，即已臣服。

大明很有面子，真是个天下的中央之国，很有派头地安排了使臣去宣诏册封了该暹罗的新国王。但《明实录》（当时是保密的，不对外公布）的该年七月条只简记暹罗使来朝贡方物和请封王，而连林霄等的名字也未提到。

只是事隔23年后，到了另一个皇帝孝宗之后的又一个皇帝武

宗登基（1505年）的第二个月，方在给事中任良弼的建言中提到：“如往时给事中林霄之使满刺加，不肯北面屈膝，幽饿而死，而不能问其罪。”<sup>①</sup>这才透露了点真相。今人陈学霖先生撰《明成化林霄出使暹罗之谜》一文<sup>②</sup>介绍了《台州府志》中《林霄传》的记载，而搞清楚了真相原来如此：“霄，字克冲，号勿斋，幼号奇童。年十五，食廩学宫，以优等供太学，登成化十四年进士第。入翰林，升刑科给事中。十八年，暹罗遣使入贡且告丧，帝命霄及行人姚隆往封其子国隆勃刺略坤息刺兀地为王。其国在占城西南，顺风十昼夜可至，人皆危之。霄曰：‘君即天也，顾辱命，见惧何足危。’至其国，以议相见；礼不合，遂不肯宣诏。除馆西郊，供帐甚薄。霄不屈，愤愤成疾死。姚隆折节，获厚宴宝贿以归。帝闻罢隆，诏霄子非为国子生。其赠敕有曰：‘仗节不屈于蛮邦，结愤竟归于冥汉。’著有《勿斋集》。”<sup>③</sup>

## 二、与西域的交往

元末时，拂菻国，张星烺、韩儒林、沈福伟等认为其地在今叙利亚一带；冯承钧、陆峻岭、蔡美彪等认为其为东罗马帝国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地。我遍稽有元一代史籍，考证各事所系的其地不尽相同；但多数史事所涉者，皆在欧洲境内的公教地区。<sup>④</sup>人捏古伦来中国做生意，因元亡，东西交通阻塞而不能归。洪武四年八月，明太祖召见捏古伦，请他“赍诏书还谕其王”。此诏书

① 《明武宗实录》，孝宗弘治十八年六月庚午。

② 陈学霖撰《明成化林霄出使暹罗之谜》，载于中华书局编《文史》1999年第四十八辑。

③ 光绪《台州府志》卷五八《人物传二》。

④ 详见拙文《元代拂林及爱薛生地望辨正》，载于《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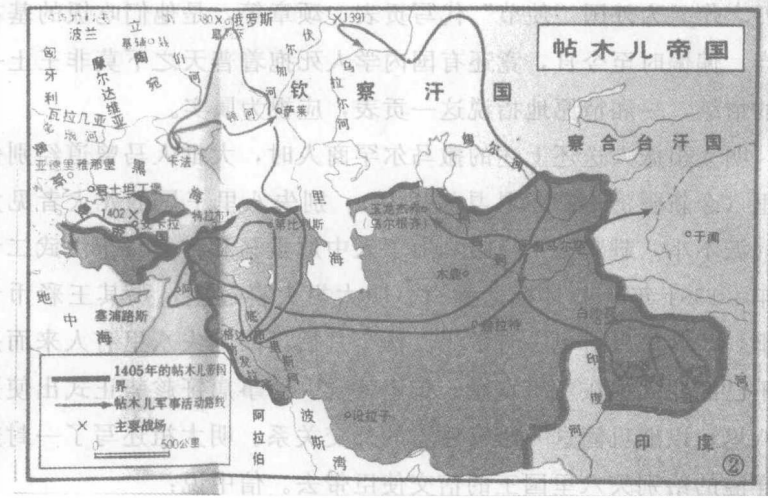
就称：“自有宋失驭，天绝其祀。元兴沙漠，入主中国百有余年，天厌其昏淫，亦用陨绝其命。……朕为臣民拥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于今四年矣。凡四夷诸邦皆遣官告谕，惟尔拂菻隔越西海<sup>①</sup>，未及报知。今遣尔国之民捏古伦赉诏往谕。朕虽未及古先哲王，俾万方怀德，然不可不使天下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兹诏告。”<sup>②</sup> 捏古伦回国办事，明太祖给的盘缠及国信礼必不少。只是捏古伦西去，杳如黄鹤，再也无了音信。明太祖只得再派使臣普刺“赉敕书、彩币诏谕”。《明史·拂菻传》称：“其国乃遣使人贡。”其实是洪武八年，拂菻国有使节在马来半岛，当地三佛齐的使节与之同来中国。《拂菻传》所称的遣使人贡当即是指此事。

明太祖在海外的外交成果有限，而在西域的外交也同样难以奏效。《明史·西域传四》如实地记述：“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诏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明太祖在西域外交的重点目标国之一是撒马尔罕。当时，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中部的大都市）实为帖木儿帝国的首都。但该国从不肯报聘。明大将蓝玉远征沙漠，至捕鱼儿海，收获了数百名撒马尔罕商人。明太祖派官吏把这批人送还了撒马尔罕。直到大明建国二十年的时候，撒马尔罕的王——帖木儿大汗才第一次派哈非思出使中国。

哈非思出使中国的目的已不能被确切地知道。很可能正是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在撒马尔罕时所了解到的帖木儿曾派人赴中国首都居住六个月，从事对大明国情的间谍性调查。

<sup>①</sup> 《明史·拂菻传》所录的明太祖给拂菻王的诏书谓“惟尔拂菻隔越西海”，但查《明太祖实录》，知诏文原为“惟尔拂菻隔越西夷”。又核之《殊域周咨录》，此后书记作“惟是拂菻隔越西夷”。看来《明史》中的“西海”一词，为清代馆臣擅改而出。

<sup>②</sup>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国列传七》。



捉刀之作。为外国“使节”代写贡表、颂章等，是他们吃饭的基本行当。偏偏时至今日，竟还有国内学人死抱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类的情结，一厢情愿地指说这一贡表，应视为属实。

明太祖派人送还上述的撒马尔罕商人时，大批人马曾道经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县县城以北）。别失八里王黑的儿火者见大明气派不小，赶紧派千户哈马力丁入中原贡马和猎鹰。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七月抵达南京。明太祖大喜过望，赐其王彩币十表里，对其使者，也各有赏赐。两个月后，因别失八里有人来而兴奋不已的明太祖派主事宽徹、御史韩敬、评事唐征趁势正式出使别失八里，以期巩固这一难得建立的外交关系。明太祖还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给别失八里国王的信交使臣带去。信中说：

“朕观普天之下，后土之上，有国者莫知其几。虽限山隔海，风殊俗异，然好恶之情，血气之类，未尝异也。……王即遣使来贡，朕甚嘉之。王其益坚事大之诚，通好往来，使命不绝，岂不保封国于悠久乎！特遣官劳嘉，其悉朕意。”<sup>①</sup>

哪知，别失八里嫌宽徹带来的赐品不够丰厚而拘留了宽徹。韩敬和唐征则被驱逐回中国。六年之后的洪武三十年，明朝又派人带上明太祖的一封措辞谦恭的请求释放宽徹的信到别失八里；宽徹才得以被放归中华。

而在撒马尔罕西更远的帖木儿帝国所属的沙哈鲁王子所据的哈烈（今阿富汗西北境的赫拉特），则同样对大明国的使节不予理睬。因哈烈是闻名西域的国度，它不肯交接大明，是让大明很没面子的事。所以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时，明太祖派官员往哈烈，赐以文绮、彩币。哈烈还是不肯派使人东来。三年后（1395年），明太祖又派给事中傅安、给事中郭骥、御史姚臣、中官刘惟等由官

<sup>①</sup> 《明史》卷三百三十《列传第二百二十》。

兵一千五百名护送着前往，同时，顺道访问途中的撒马尔罕。不料在经过撒马尔罕时，全部人马皆被其大汗帖木儿拘禁。

傅安，字志道，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本为南京后军都督府吏，调任四夷馆通事、舍人、鸿胪寺序班。之所以如此调任，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会某种西域语言，我推测他的祖上可能为西域入华的色目人。洪武二十七年，傅安被提拔为兵科给事中。次年，即被选派出使西域。有波斯人毛拉那·歇里甫·爱丁·阿



帖木儿（Timur 1335—1405），帖木儿帝国君主，1370—1405年在位。

黎·叶兹德为帖木儿撰有《武功记》。几十年前，张星烺从中节译了有关内容如下：“1396年，帖木儿在细浑河（即锡耳河）畔乞那思镇过冬时，契丹国皇帝唐古斯汗之大使数人，携带珍品多种来朝。大首领引之觐见后，使臣献呈礼物，报告通聘目的及交呈国书。临行，复蒙召见，辞归国。”<sup>①</sup>所记的当是傅安使团的到来。契丹国，是彼处人指谓的中国。唐古斯汗意谓猪皇帝，因中国人吃猪肉，故称。在何年“辞归国”，则不明。被扣押十三年后，傅安等才被释放回中国。同行的御史姚臣、太监刘惟，皆已亡故。官军一千五百人，生还者仅十七人。<sup>②</sup>如果上文的“辞归国”，是在1396年（洪

① 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

② 《明》陈继儒撰《见闻录》卷一。



武二十九年)的当年,那么还可能寓示出帖木儿在有礼貌地再次召见傅安等以告别后为什么又下令逮捕了中国使臣,并把整个中国使团一扣就是十三年。显然,傅安等在辞别后并没有回中国,在经考虑后,继续西行,从而激怒了多疑又狂妄的帖木儿大帝。

帖木儿刚刚征服了西边的大帝国伊朗。帖木儿帝国的疆域空前扩大,国势强盛,如日中天。史记帖木儿接见中国使节时,“骄傲不顺命,谓中国去我远,天子何如我何也!”始终“负固不服”,甚至“讽安使降”,而要中国大使傅安投降。既然中国的来人本想窥测帖木儿帝国以西的情况,那么,傅安等被拘后,帖木儿为让中国人知其帝国之广大,让人押送傅安等“由小安西至讨来思,安又西至乙思不罕,又南至失刺思,还至黑屡诸城,周行万数千里”,<sup>①</sup>阅六年,才返回撒马尔罕。但傅安仍然坚贞不屈使命。



克拉维约

于1404年(明永乐二年)抵达帖木儿帝国的西班牙大使克拉维约(Clavijo)曾在撒马尔罕见过中国使臣。克拉维约获知:“中国专使来此之使命乃向帖木儿催纳欠贡。”克拉维约还记述他在拜见帖木儿时,“有王公一人走向中国专使之前,传帖木儿之旨:‘帖木儿现与西班牙国王亲善,帖木儿待之如子。视中国专使如敌寇,为帖木儿之

敌人,今日特引见西班牙使团于中国专使之前者,即以示帖木儿不

<sup>①</sup> 万斯同撰《明史纪传》卷五十三《傅安传》。